

Yang Yang



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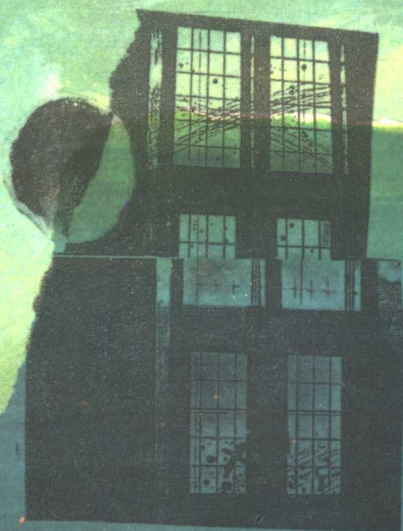
# 月光下的追忆

杨 扬 著

Y U E G U A N G X I A D E Z H U I Y I

我用黑色的小字纺织一个花篮，以此祭奠死去的十年，告慰我无法平息的青春梦幻。

山 东 友 谊 出 版 社





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

# 月光下的追忆

Y U E G U A N G X I A D E Z H U I Y I  
杨 扬 著

Yang Yang

山 东 友 谊 出 版 社

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

月光下的追忆

杨 扬 著

\*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5 插页 200 千字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551—951—X

I·189 定价: 15.80 元

●月光下的追忆

●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

## 序

李庆西

近世以来，文学上的言论总归不是文学自身来消化，而往往给社会思想变革提供着有利契机。当年，梁任公作《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就是要借文学力量达到其改良中国政治的目的。这是一个相当显著的例子，以后的五四新文学思潮，也便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推动力。近者如80年代初之种种情形——关于形象思维和艺术规律的讨论，针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人道主义及异化问题的争鸣，以及西方文艺理论的大量引进等等，无不与当日的思想解放运动呼吸相通。处于大变动时期，文学介

入社会舆论乃至人们的精神生活，大抵是势所使然。至少是时势提供了这种可能。然而，文学理论批评所具有的启悟作用，同样也启发了文学家乃至各路文化人藉此改造世道人心的主体意识，这就使得他们的语言空间有时可能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理想国。确实有过这样的事例。譬如，20年代末，新月派同人跟国民党意识形态发生了尖锐矛盾，实际的事端就是他们手里的那份文学刊物发表了自由言论。那时候可算是国民党政府的太平年景，并不是煽动舆论的有利时机。可是，“天降大任”的文化使命，很容易使当事人忘记了自己所处的历史位置。有情况表明，甚至在更加稳定的社会环境里，也时常发生着意识形态的颠覆活动。曾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周扬在五六十年代介绍别、车、杜的文艺理论，竟是企图对禁锢严密的意识形态作出适度的修正。

现在回想80年代中国文坛之种种情形，依然令人回肠荡气，感慨不已。诚然，昨日一番辉煌，并非基于文学的实绩，而是人的觉醒。许多有关文学的争论，如今看来虽说多有心浮气躁之处，却也有着真诚的声音。那些真正记取了历史教训的沉挚之言，几乎是“直搗血性为文章”。遗憾的是，一切都过早地结束了。我们的文学批评在经历了80年代的活跃期之后，最近三五年来却是日渐消歇。批评家和理论家们在检讨学风、引入欧美的“学术规范”的同时，悄然转换了自己的价值目标。也许，在许多人看来，现在是一个注重信息资料和技术分析的时代，是一个手段大于目标的时代，是一个必须改换门庭、重塑自我形象的时代。因而，在有了许多后结构主义式的诠释手段的同时，文学批评的价值目标终于消失在一系列代码指涉的概念转换之中。

文学批评，说起来不至于有着救国救民的重要性，似可归入学术操作一类；可是，这里边不存在任何可以预先设置的程序，所以未必只能像电脑似的作为一种信息处理工具而任人摆弄。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付诸良知的精神活动，是批评家的人格体验，而绝非“学术”二字所能道尽。所以，真正的理论批评活动，应是浩然独得之学，必有其自主意识，故而不乏鸢飞鱼跃之乐。然而，此般学行如今已不多见。

处于时下这种文化境遇，也就容易体会鲁迅作《野草》题辞时那种心情：在沉默中怀着希冀，一开口又觉得空虚。如今，面对失去了精神目标的学术秩序，面对自我陶醉的学术包装，面对发展至上的理性原则，以及那些从温饱奔小康的各色文化人等，你能够说什么呢？于今希望亦恐怕不在自己身上。鲁迅在颓唐之中终是不能卸却自己的使命，而我辈则混浊于世，愈难自拔。可是亦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的思想、趣味，大概也还未被什么力量所统一。搞批评的，搞理论的，或是做文学史的，总有一些自存主见的人物，于寂寞中，做着自己的事情。

在这些我所称之为“自存主见”的学者中，有一位杨扬先生是值得人们注意的。我最初读到杨扬先生的文章，眼里便是一幅鸢飞鱼跃的图画，心里骤然大快。杨扬研治中国现代文学，却并不囿于一端，顺着“五四”先贤披荆斩棘的艰难足迹，关注着文坛种种现状，一直到如今左右逢源的“先锋文学”。这种广阔的研究视界，并非杨扬所创设，10年前就有人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但杨扬做的不是一般的宏观研究，而将注意力相对置于某些颇有意味的个案上边。如，早年商务印书馆以其民间独立地位推动20年代新文学发

展的事况，在他笔下成了一个很好的题目。他精辟地分析了商务印书馆这个大型出版机构（作为一种经济、文化组织）的运作特点，以及如何运用作为民营企业的文化策略，在当时的局势下坚持独立自主的出版方针。这就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文化人可以安身立命的东西？杨扬显然注意到，文化上的终极关怀与即时的政治目标之间的某种不可调和性（这往往是现代人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他一再强调文化发展的自身价值。然而，当他用同一眼光观察 90 年代的新锐文学时，却发现这种价值已很难找见。在《先锋的逃逸》、《开放社会的文学与批评为什么会出现衰退》这些文章里，他对那些戴着“先锋”面具的新进作家、批评家支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兼容性”表示深刻怀疑，并且敏锐地揭示了传媒工具在 90 年代文化蜜月中的粘合剂作用。这个后现代神话的实质就是，借助“先锋”的语言外壳，消解文学自身的精神指向。

90 年代的事况可谓一言难尽，不提也罢。杨扬站在历史的彼岸，接受中国文学传统的自由精神和“五四”以来的文化使命感，反省文化价值取向的曲折历程，其间很可能有一番自我确认的踌躇。当然，这不是他独自面临的问题，当许多学人歧路彷徨、落荒下海之际，学术的命运多半也被纳入了蒸蒸日上的文化市场。古人云：务于空虚与溺于功利者均失。中国文人的毛病就是这两条——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时势造就了许多这样两头沾边的人物。然而，杨扬却甘于寂寞中暗修自守，自寻乐地。而学以为己，亦必有自得其乐之处。

杨扬是钱谷融先生的学生。钱氏门下俊彦如云，各诣精境，后人研究今日之学术情形，此则或可作一话题。

杨扬将他的文章结集为《月光下的追忆》，嘱我为序，爰记感想如上。

1996. 10. 9

# 目 录

## 序 (1)

### 第一辑 文学批评

城乡冲突:是文化冲突,还是一种权力秩序

——对中国当代文学中城乡冲突主题的一种思考 (3)

先锋的遁逸

——论当代先锋文学、先锋批评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18)

开放社会的文学与批评为什么会出现衰退? (31)

重返文学史

——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种新期待 (44)

大众时代的大众文化

——从比较文化的视野看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 (61)

论文学与文化的内在冲突 (76)

文化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历史过程

——论张承志的文化批判 (89)

新时期文学价值的倾斜与调整 (99)

论文学的审美情绪功能 (113)

文学批评形态的艺术分类 (123)

论文学中的荒诞和怪诞 (132)

寻找神话精神的两种心态

——对欧洲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一种文化

阐释 (146)

## 第二辑 百年中国文学

论五四新文学的价值特征 (157)

对五四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 (173)

夏娃的聚讼

——论“五四”时期女作家的创作 (182)

陌生的同路人

——论“五四”时期茅盾文学观 (197)

商务印书馆与 20 年代新文学中心的南移 (221)

清华、北美学风与闻一多文化个性的形成 (238)

后记 (277)

## 第一辑 文学批评



●月光下的追忆

●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

## 城乡冲突： 是文化冲突，还是一种权力秩序

——对中国当代文学中城乡冲突主题的一种思考

**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了许多表现城乡矛盾冲突的作品。所谓城乡冲突主题，是指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代表现代工业文明的城市文化与代表中国固有传统道德的乡村文化之间出现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对于任何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度，在从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向现代化工业生产方式过程中，是都曾出现并都将可能出现的。但对于当代中国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来说，这种城乡冲突还有更为特殊的涵义，即城乡冲

突作为一种文化矛盾，是相对意识形态冲突而言。所谓意识形态，简言之，即指政治权力。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城乡冲突主要不是通过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意识形态关系来体现，而是通过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情感方式及生活方式的描述表现出来。像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作品”、张炜的《九月寓言》，都是通过平常人的日常生活，表现出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内心激烈动荡的矛盾冲突。当然，批评家们在阐释这类作品过程中，也是刻意于从家族史、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角度阐发城乡冲突的文化意义。但不管批评家们怎样强调城乡冲突的文化意义，也不管作家们怎样精心编织那些文化故事，有一种现象无论如何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那就是所谓的城乡冲突中的一面——城市生活，在当代文学中总是显得非常薄弱，很少有当代作家靠出色地描写城市生活而蜚声文坛。即便像张承志、张炜这些极见艺术功力的作家，当他们写到城市生活时，也或多或少显得力不从心。要么将城市描绘成“恶”的象征，要么以城市的表面繁荣来替代对城市人内心心理复杂性的刻画，总之，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描写远不如他们对草原、对北方的河、对胶东半岛荒山野地的描写来得出色。那么，为什么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中会产生这样奇异的文学现象？究竟是什么力量阻碍了我们的作家在感受和表现现代城市生活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呢？

---

事实上，当代中国作家并不缺乏表现城市生活的写作热

情。他们绝大部分人都栖息于城市或竞相进入城市生活行列。城市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并不太陌生，而且他们也非常愿意表达自己对城市的情感。新时期文学中，就有不少人喜欢称自己为城市诗人，也有批评家乐意接受城市漫游者的称号，像当代作家高晓声那样通过比较城乡生活差异而肯定城市生活的文学作品并不在少数，因此，我们实在不能说当代中国作家对城市生活有一种天生的敌对情绪和防御心理。但问题是为什么在表现城市生活时，他们的这种经验，这种留恋城市生活的激情，都变得微不足道、毫无生气了呢？

在我看来，导致这种生活经验无法转化成审美经验的最直接原因，来自当代作家和批评家对城乡文化冲突的特殊理解。我注意到当代作家和批评家在谈到城乡文化冲突时，除了将这种冲突区别于意识形态冲突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将城乡冲突当作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之间的冲突来处理，即城市文明代表了现代工业文明，农村则代表落后的乡村文化。但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究竟是一个文化色彩浓于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还是意识形态仍渗透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社会。同时，对于生长在城市中的人来说，是否真正强烈感受到不同文化之间的激烈冲突，换句话说，在城市与乡村，中国当代作家们是否真的认为处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的支配下。假若将上述两个问题与我们个人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具体感受加以对照，我想现当代作家、批评家对城乡冲突所持的那种文化冲突观点，相当程度上属于一种虚构的观念。

的确，在一个旧的意识形态面临调整之际，人们往往会有一种心理上的解放感，仿佛蜕去一层旧皮似的将原来的苦难连同沉重的心理负担统统剥去。但这并不是说，意识形态

作为一种社会的支配力量，轻易便能从原有生长中消退，相反，它只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占据当代生活的中心。对照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及其批评，我始终感到我们的价值参照的主要对象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已被文化价值标准所取代，而是仍然以一种权力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标准作参照，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当代中国这个特殊的思想国度里，文化也成为一种特殊的支配权力，那些表现人们日常生活民俗风情的文学作品，并不是真正按照文化和民俗的逻辑和要求以自己的方式展现，相反，它们已蜕变成另一种社会思想力量与当代意识形态相抗衡。比较一下沈从文的创作与当代作家汪曾祺的创作，我们会看到，构成沈从文“湘西世界”的因素是真正文化上的。它不需要与某种意识形态对抗，进而在对抗中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内在的价值参照物来接受。在《萧萧》这部经典性的作品中，构成萧萧这一女性个性的是一种纯粹人性的力量，那种与自然山水契合无间的亲密关系，不仅显示出萧萧这一人物本身的性格合理性，也构成了这部作品自足自在的文化世界。假如将民俗真正保留在最原始的意义上进行解释，那么，沈从文的这部小说是真正能够揭示出这种民俗意义的。但在当代作家汪曾祺笔下，民俗虽存，但神髓已去，各种民俗的描绘，远远没有沈从文笔下那般源源不断的生气，而沦为一种摆设甚至是装饰，因为它缺乏原始意义上民俗的那种强大生命力与自足自强的独立性格。在汪曾祺《受戒》这篇最为精心构写的文化小说里，我们不难看到作品渲染的情调所对抗的是象征当代意识形态的那片锣鼓喧天的闹忙天地，用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作比喻，汪曾祺创作这部作品时，仿佛是一只眼睛睁着，而另一只眼睛闭着。闭着的眼

睛在构写《受戒》中那纯粹乡风世俗的民间故事，而睁开的眼睛则时时提醒他这是在做梦，无非编编故事而已。所以汪曾祺的小说即便是那些写得最好的，也已完全缺乏沈从文当年创作“湘西世界”时所具有的那种沉浸和完全投入其中的艺术心态，而成为我们这个意识形态世界中特有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我在这里当然不是要否定汪曾祺的创作，而是要说明人们是怎样被一种虚妄的文化现象所迷惑，以为真能撇开意识形态而沉醉于所谓的文化世界。事实上，汪曾祺是清醒的，他始终在告诫人们，别忘了注意他《受戒》中那片喧闹的锣鼓天地，那是一个时代打在作品上、同样也打在每个人心灵上的时代印记。

这样说来，在中国的城市中生活并不意味着真正生活在城市。城市是什么？简言之，是与乡村文明不同的一种现代文明形态。构成城市文化形态的东西当然要通过外部的物质形式表现出来，比如高速运转的交通，拔地而起的城市建筑，代表城市优雅风范的街区文化、雕塑、街头流浪艺人和数不尽数的绿草坪和街心花园。但在这之下是拥有潜伏到每个世人心目中的一种现代价值观念支撑和管理着城市的一切。单单以城市来象征城市文化，以咖啡馆、大饭店、川流不息的人流来象征现代城市文明，实在是太表象了。在一个乡村文化支配一切的社会中，簇新的宾馆和街道同样可见，暴富的豪门宴席和灯红酒绿的场面也并不少见，但城市文化追求效率和管理的城市有效性原则，在这里荡然无存。处在乡村文化之中的中国城市生活并不提供一种生活在别处那样的文化差异感，让你觉得城市与乡村真正形成了文化上的对照。相反，生活在城市与生活于乡村，至少从感觉上来说并没有根